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尊隐 大同书

默觚 仁学

采西学议 建国方略

使西纪程 砭旧危言

弢园文录外编

筹洋刍议 卮书

盛世危言 新民说

论世变之亟 猛回头

新政真诠 睡的人醒了

强学—戊戌时论选

民声—辛亥时论选

新潮—民初时论选

采西学议

冯桂芬 马建忠集

郑大华 点校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采西学议：冯桂芬 马建忠集/郑大华点校.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53-1

I. 采…

Ⅱ. 郑…

Ⅲ. ①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②政论-中国-近代-选集
③冯桂芬-文集④马建忠-文集

Ⅳ.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50,000 印张：7 $\frac{7}{8}$ 插页：5

印数：1—1,583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富娟

责任校对：刘亚杰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定价：8.2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冯桂芬，中国近代早期具有进步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字林一，又字梦奈，号景亭，江苏吴县人。1809年出生在一个拥有“薄田十顷”的地主家里。他自幼博览群书，通晓经史，早负盛名。1832年中举人，1840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做过顺天府试同考官和广西乡试正考官，1856年升任詹事府五品中允。

冯桂芬所处的时代，正当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来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百孔千疮，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更加重了封建统治的危机。为应付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致力于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冯桂芬也深受其影响。早在1832年，作为一个刚20岁出头的青年人，冯桂芬就经常到苏州的紫阳和正谊书院听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讲学，并得到林的器重和赏识。后来，他又相继作过陶澍、裕谦的幕僚，和姚莹、张穆、陈庆镛等当时一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相交往，讨论学问，关心时政。1859年，由于他对官场种种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受到权贵的打击排挤，不得不托病辞官返籍，在家乡课业授徒，从事教育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冯桂芬对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十分愤慨，呼吁自强雪耻，认为中国“受制于小夷”，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但当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他又极力主张“借洋兵助剿”，并逃到上海，参加江浙官绅和外国侵略分子合办的会防局，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晚年，冯桂芬在苏州、扬州讲学、著书，1874年去世。

冯桂芬一生著述颇丰，有《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学算法直解》、《显志堂诗文集》等多种，但影响最大，使他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1861年成书的《校邠庐抗议》。

《校邠庐抗议》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诸如选拔官吏、办理外交、保甲团练、财政金融、土地赋税、盐政水利、对外贸易、改革科举、采用西学、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问题，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然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特色，具有启蒙意义的是他的“采西学议”，即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觉悟的呼声。然而在19世纪50—60年代，却被视为“非圣人之法”，的异端。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新生事物，幻想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他们攻击学习西方是“以夷变夏”，斥责主张学习西方的人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对于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

中予以了义正词严地驳斥和抨击，他指出：“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因此，处今日之世，而拘泥成法，因循苟且，反对向西方学习，这只能使自己更落后，更愚昧，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他嘲讽顽固派说：“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所以他主张：“法苟不善，虽圣人吾弃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西学如果能使中国富强，中国就应该“采西学”，“制洋器”向西方学习，“始则师而德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否则，“不独俄、英、法、美之为患也，我中国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

当然，学习西方，首先必须弄清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知己知彼，才能扬长避短，将西方好的东西学过来。冯桂芬根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认为中国在五个方面“不如夷”：第一，“人无弃才不如夷”；第二，“地无遗利不如夷”；第三，“君民不隔不如夷”；第四，“名实必符不如夷”；第五，“船坚炮利不如夷”。他已朦胧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在19世纪50—60年代，对中西差距的认识能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这是很了不起的。当时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虽然也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认为要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但是他们只看到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

因此他们所要学习的“长技”，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到70年代后，洋务派才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着手建立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他们始终也没有达到冯桂芬对中西差距的认识水平，坚持认为中国“船坚炮利”虽“不如夷”，但政治、经济、文化，也即中国的封建制度却比西方资本主义优越、不存在“不如夷”的问题。所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学习西方的运动推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

针对中国在五个方面的“不如夷”，冯桂芬提出了改革科举取士制度，设立同文馆，培养西学人才；大力兴修水利，发展粮食生产，改革生产工具，广植桑茶，开采矿山，扩大对外贸易；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肃清吏治，严惩贪官，整顿军队；“复陈诗”，以诗文形式反映民间要求和疾苦，消除君民的隔阂；设厂制造、引进西方的先进机器等一系列主张，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其条目之细，范围之广，是前所罕见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冯桂芬认为，“采西学”，“制洋器”，“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富强中国，抵抗外侮。因此，他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大加赞许，说它是富有之策，自强之本，只有“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能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才能“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冯桂芬也有他的历史和阶

级的局限性。他虽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极力主张“采西学”，“制洋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改革，但他并未脱离封建思想的巢臼，认为封建制度是不能根本改变的。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贯穿于《校邠庐抗议》的思想核心。就此而言，可以说冯桂芬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至远至深的思维模式的发明者。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上承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有大的发展，下启洋务思想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而都对它有所扬弃。洋务派思想家继承和发挥了他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但剔除了他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继承和发挥了他“采西学”，“制洋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变革的主张，但又突破了他从根本上不敢触及封建制度的思想禁锢，而提出了兴民权。设立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所以，与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比较而言，冯桂芬无疑是进步的，但比之资产阶级维新派，他又是落后的。当然，这种落后主要是由历史造成的，因为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未产生和形成的19世纪50—60年代，他不可能具有和提出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的思想和主张。

《校邠庐抗议》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从80年代起被频繁刻印，广为刊布。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光绪皇帝又下

令刷印 1 000 部，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名官签注意见，或加以评论。后人曾评论《校邠庐抗议》一书，“言人所难言，实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

无论就年龄还是思想属性而言，冯桂芬和马建忠都属于两代人。冯桂芬是中国近代早期具有进步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而马建忠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冯桂芬出生于 1809 年，而马建忠出生在 1844 年，比冯小整整 35 岁。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少年因太平天国战争随家迁居上海，入外国教会学校读书。从此，他弃绝科举，研究西学，探求“中外得失之故”。1870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成为洋务派首领人物，马建忠投奔其门下帮办洋务。

1876 年，因“马嘉理案”，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谢罪”，马建忠随往。第二年，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并兼任中国驻法大使郭嵩焘的翻译。马建忠学习勤奋，在一年后的考试中，成绩取得优等，得到老师的奖励，后来在友人的鼓励劝说下，他又参加了法律、政治、外交、理科等科目的考试，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学位的东方人。

当然，马建忠在欧洲的最大收获，是通过自己的认真观察，发现资本主义欧洲不仅仅像洋务派所说的那样，只在船坚炮利和制造方面比中国先进发达，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比中国先进发达得多，从而引起了思想认识上

的重大变化。1877年他写信给李鸿章，汇报了自己来欧洲的思想认识：“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它标明马建忠已开始突破洋务思想的羁绊，而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向跨出了决定意义的一步。

马建忠在欧洲留居了四年，其间写下了《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论洋货入内地免厘一事》和《巴黎致友人书》等文章和信件，阐述了他关于保护中国关税，借洋债修筑铁路，“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以及培养外交人材等等主张，并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大量的介绍。他称赞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立法、执法、审法三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所以“其政事纲举目张，灿然可观。”他在称赞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又对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以及贿赂公行、朋比奥援等恶劣风气进行了揭露。

1880年，马建忠回到国内。清政府授予他道台衔，李鸿章对他也很欣赏，把他从一般随员提升为主要幕僚。1881年，李鸿章为加强海防建设，派马建忠视察北洋海军重要基地旅顺口。事后，他对发展新式海军提出具体建议；主张参照西洋“水师之法”，设立水师小学、大学堂，以造就海军指挥人才；同时按照新法训练士卒，添购制造新式船

舰、增强实力、加强海防。是年夏，李鸿章又派他到南洋各地调查鸦片进口情况。经过实地调查，马建忠提出：“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1882年，马建忠又受李鸿章的指派赴朝鲜帮办外交，参与朝鲜和英、法、德三国的通商谈判，并于同年夏设计平定了朝鲜国王李熙之父李是应发动的政变。马建忠的办事才能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对他也益加信任和重用，1884年，派他为轮船招商局总办。1890年又调为上海织布局总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中国开始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对此，马建忠深感不满。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实行富国富民政策。在其早期（1884年前）的著作中，他就一再提出过保护商会，发展贸易，减轻商税，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主张。中法战争后，马建忠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1900年，他写下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富民说》一文，对自己的主张作了系统的阐述。

马建忠在《富民说》里开宗明义就写道：“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求富之源，首在通商，其次在开矿。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从而造成外贸入超，白银大量外流，是导致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所以“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矿山自有之财。

采取矿山自有之财，则工役之散，不出中国，宝藏之聚，无待外求，而以权百货进出之盈虚自无不足矣。”他主张大力发展丝、茶等主要出口产品，以“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采用外国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纺织业和采矿业，“仿造外洋之货，改其销路”。他反对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协定关税，要求清政府利用“修约”的机会，争回关税自主权，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他也反对洋务派官僚对工商业的垄断，主张废除上海织布局“专利十年”的规定，要求民族资本向该局投资，“扩充资本，或再立新局”，提倡“商人纠股设立公司”，兴办新式工商业，以加强本国产品对外竞争的力量。这些主张，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由于他长期担任李鸿章的幕僚，和洋务派以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如何达到“致富”的途径上，马建忠又对洋务派和清政府存在着幻想和依赖，建议清政府设立商务衙门，向外国贷款。由清政府牵头，将通商、开矿等大事，先易后难，次第举行。实际上这只是他一厢情愿而已。

不久，马建忠因上海织布局筹款困难，谤声四起，加上他“富民”主张与李鸿章“洋务”政策的矛盾，他辞去上海织布局总办一职，在上海“撰斥家居”，从事著书和翻译工作。

进入90年代后，经明治维新而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把侵略的矛盾对准了中国，并于1894年终因朝鲜问题而挑起了中日战争。这时，“撰斥家居”的马建忠，“蒿目时艰”，建议清政府创办翻译书院，培养译书人才，广译西书，“使

吾士大夫之在位者尽知其情实，尽通其壅蔽。”他强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战胜于疆场则然，战胜于庙堂亦何独不然。”然而，他的建议，如同他的“富民”主张一样，再次受到清政府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的冷遇。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此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在政治上已心灰意冷的马建忠没有卷入维新变法运动的洪流中去，而把全部精力用于整理和出版著作。1896年，他的《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印行。两年后，马建忠的另一部著作《马氏文通》也脱稿了。《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是他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至今，《马氏文通》的语法分类、定义和许多概念仍在使用。

1900年，马建忠因积劳成疾而去世，享年55岁。

和冯桂芬一样，马建忠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称赞马建忠“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①而他所发的议论，提出的建议，大多收录于《适可斋记言》之中，所以《适可斋记言记行》出版后，曾广为流传，多次再版重印。

根据“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文库”编委会的要求，本书

^① 《适可斋记言记行》，“梁启超序”。

收录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校邠庐抗议》采用的是戊戌八月藩氏刻本。在此书的目录后，附有冯桂芬嫡孙冯世澂的一段说明，现抄录于后：“先大父所著《校邠庐抗议》四十篇，外附‘以工巧、为币’、‘用钱不废银’二篇，即‘自序’所谓‘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是也。尝命世澂录原稿存于家，盖当时定本如此。甲戌先大父见背。先大夫校刊遗集，尝登十五议于集中，初无家刻专本，顾传抄既广，如津门广仁堂本，吴门藩氏本，遂先后出。尝取校两本篇次，字句互有不同，盖皆非先大夫手定本也。豫章句刻校虽体例未善，一书之中提行空格杂出不一，又删改原序，几失其真，而夺漏舛讹无论矣。今刻悉依家藏定本，篇次先后仍其旧，并取遗集中‘均赋议’等七篇，及未刊外集‘太湖收船议’等五篇附入焉”。这也是本书采用戊戌八月藩氏刻本的原因。《适可斋记言》采用的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初刻本。《校邠庐抗议》，除《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收录了其“自序”和“采西学议”等18篇外，尚未有新点校本出版。《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过竖排繁体字点校本，本人在点校《适可斋记言》时参考过该点校本，对此向该书点校者张恺之先生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上时间仓促，点校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郑大华

1993年12月于北京西郊八角村学步斋。

目 录

总 序	张岱年 1
编 序	1
上篇 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 1
自 序	1
卷 上	4
公黜陟议	4
汰冗员议	6
免回避议	9
厚养廉议	10
许自陈议	13
复乡职议	14
省则例议	16
易吏胥议	19
改捐例议	21
绘地图议	23
均赋税议	24
稽旱潦议	26
兴水利议	27
改河道议	30